

# 壮语量词的语法双重性

薄文泽

[提要]文章在总结诸家不同看法的基础上认为壮语量词有双重性，可与数词结合构成数量单位，也可作为中心成分受名词及名词修饰语的修饰。

壮语的量词在很多方面具有与汉语相同的特点，因而我们很容易把它跟汉语量词放在一起比较。但是壮语量词在分布上又具有许多和汉语不同的特点，这使得它在句法结构中的地位呈现出与汉语不同的面貌。长期以来，虽然有许多学者曾经对壮语量词进行研究，但各家观点歧异较大。各家的分析都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因而其分析结果也只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放在整个结构系统里检验，则各家学说的解释力都限于一定的范围。因此，壮语量词在体词性向心结构中的地位与性质问题至今依然悬而未决。

张元生、袁家骅、韦庆稳、梁敏、季永兴等学者曾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壮语量词进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这对我们全面地认识量词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综合这些观点，再考察壮语语言材料的实际，感到壮语量词在单独与名词组合时和与数词、名词共同组成一个结构时性质有所区别。即，壮语向心结构中的量词与数词在语序上相连，共同作其他成分的修饰语时，在语法上表示事物的单位，而在处于名词性结构中心位置时则在语法上以表示类别为主，当两种用法混合在一种结构里的时候则兼表单位和类别。

下面我们具体考察壮语量词的语法分布和性质特点。

## 一 壮语量词在体词性向心结构中的分布

讨论量词的句法分布，必然要涉及名词和名词性结构，所以这里讨论的是量词相对于名词的句法分布以及量词在不含名词的名词性结构中的分布。

1. 壮语的名词和汉语的名词一样，一般不能直接与表示数量的基数词组合，名词与数词组合一定要通过量词，数、量、名的组合有两种语序：

当数词大于“二”时，为“数词+量词+名词”，如：

sa:m<sup>1</sup> tu<sup>2</sup> mou<sup>1</sup> 三头猪    soŋ<sup>1</sup> ko<sup>1</sup> fai<sup>4</sup> 两棵树  
三    只    猪                      二    棵    树

当数词为“一”时，为“量词+名词+数词”，如：

tu<sup>2</sup> mou<sup>1</sup> deu<sup>1</sup> 一头猪    ko<sup>1</sup> fai<sup>4</sup> deu<sup>1</sup> 一棵树  
只    猪    一                      棵    树    一

这里的“量词+名词+一”与“数词+量词+名词”在语法上略有不同：前者不能受指

示代词修饰，<sup>①</sup>后者可以。

2. 量词一般都可以单独与名词组合，构成量名结构，表示名词所指的那一类事物；如：

tu <sup>2</sup> mou <sup>1</sup> 猪	tu <sup>2</sup> kai <sup>5</sup> 鸡	ko <sup>1</sup> fai <sup>4</sup> 树
只 猪	只 鸡	棵 树
ŋe:u <sup>5</sup> yin <sup>1</sup> 小块的石头		ko <sup>1</sup> plak <sup>7</sup> kart <sup>7</sup> 芥菜
小块 石头		棵 芥菜

关于这类结构的性质，壮语专家们的看法有一些差异，张元生先生认为这类结构都表示“一”的数量意义，理由是单个名词可以加təi<sup>6</sup>pa<sup>3</sup>“好些，很”、pan<sup>2</sup>yau<sup>6</sup>“许多”等词表示多数，而“量词+名词”的结构不能再加这些词表示“多数”。<sup>②</sup>这个观点在壮语语法研究领域很有普遍性，代表了多数壮语研究专家的意见，但是，我们对此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韦庆稳先生第一个看到了壮语量词不是总含有“一”的意思的，他虽然在一般性的论述中也说：“量词不带数词（特别是后面有定指示词时）都含有数词‘一’的意思。量词加相应的名词如：tu<sup>2</sup>mou<sup>1</sup>（只猪），有时也含有数词‘一’的意思。”<sup>③</sup>但在具体讨论到“体修词组（由名词、量词作中心词组成的名词性修饰词组）”时他又表示：

“‘量+名’修饰词组的中心语是量词。……这种修饰词组，在性质上与小类名词修饰前面大类名词构成的修饰词组是一样的。”<sup>④</sup>

这实际上否定了他自己前面的说法。

3. 量词也可以单独受能够修饰名词的词语修饰，构成“量+修饰语”的结构，表示那些量词所表示的事物（如韦先生所看到的那样）；这样构成的修饰词组是名词性的。如：

tu <sup>2</sup> bin <sup>1</sup> 飞的（那）只	tu <sup>2</sup> pjo:m <sup>1</sup> 瘦的（那）只	an <sup>1</sup> huŋ <sup>1</sup> 大的（那）个
只 飞	只 瘦	个 大

4. 量词可以直接跟指示词组合，但指示词一般不能单独与具有自然量词的名词组合，指示词修饰名词时也必须通过量词，语序为“量+名+指”，如：

tu <sup>2</sup> nei <sup>4</sup> 这只 / tu <sup>2</sup> mou <sup>1</sup> nei <sup>4</sup> 这头猪	（比较：tu <sup>2</sup> mou <sup>1</sup> deu <sup>1</sup> 一头猪）
ko <sup>1</sup> nei <sup>4</sup> 这棵 / ko <sup>1</sup> fai <sup>4</sup> nei <sup>4</sup> 这棵树	（比较：ko <sup>1</sup> fai <sup>4</sup> deu <sup>1</sup> 一棵树）

5. 壮语的量词在很多场合下可以代替名词，“量+修饰语”的结构可以像名词一样受其他词语修饰，这样构成的修饰结构也可以受指示词修饰：

tu <sup>2</sup> bin <sup>1</sup> han <sup>4</sup> 飞的那只	tu <sup>2</sup> pjo:m <sup>1</sup> han <sup>4</sup> 那只瘦的
an <sup>1</sup> huŋ <sup>1</sup> nei <sup>4</sup> 这个大的	

6. 以量词为中心语的向心结构在受数词修饰时，直接把数词加在量词的前面（“一”加在整个结构的后面），形成“数词+量词+其他修饰语”或“量词+修饰语+一”的结构。如：

sə:m <sup>1</sup> tu <sup>2</sup> bin <sup>1</sup> han <sup>4</sup> 那三只飞的	
三 只 飞 那	
sə:m <sup>1</sup> tu <sup>2</sup> diŋ <sup>1</sup> 三只红的	so:ŋ <sup>1</sup> tu <sup>2</sup> bin <sup>1</sup> 两只飞的

<sup>①</sup> 韦庆稳在《壮语语法研究》里首先看到了这个现象，参见该书76页，尽管他依然强调“量词不带数词（特别是后面有定指示词时）都含有‘一’的意思”（33页），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到，指示词跟“一”在壮语里是从不共现的，梁敏（1986）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sup>②</sup> 《武鸣壮语的名量词研究》，《民族语文》1979年第3期。

<sup>③</sup> 韦庆稳1985，33页。

<sup>④</sup> 同上第17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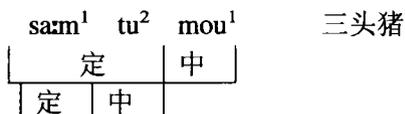
三 只 红

二 只 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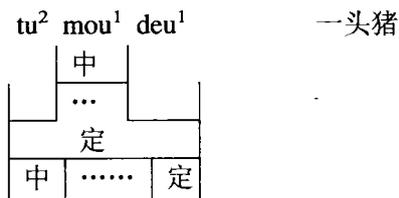
## 二 量词在体词性向心结构中的语法地位

量词在体词性向心结构中的结构地位，主要是量词相对于名词、数词和指示代词的地位。从上面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来，壮语的量词在向心结构中的分布与汉语区别较大。因此，关于如何切分含有量词的体词性向心结构，在壮语语法研究者中也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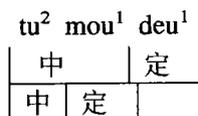
最早的壮语语法研究是以模仿汉语语法为基础的，所以早期的《壮语语法》主张壮语和汉语一样，量词先与数词组合，构成数量结构，再共同充当名词的修饰、限定成分。是数词和量词构成的数量词组共同作名词的修饰语。如果分出层次，如：



而对第二类结构的切分，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这类结构中，和第一类结构一样，名词是中心成分或被修饰成分，数词  $deu^1$  和前面的量词构成数量词组，共同充当名词的修饰成分。这种意见可以广西民语委主编出版的《壮语语法》为代表。其切分方式如果以层次分析法来表示，如：



这样的切分出现了不连续直接成分，这种不连续直接成分还不仅出现在这一类结构中，同样的不连续直接成分在其他有关的结构中都不能连接在一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产生了不同看法。这样就出现了第二种意见，认为，这类结构和第一类有所不同，其中的中心成分不是单独的名词，而是量词和名词组成的结构，数词  $deu^1$  是整个量名词组的修饰成分。即应为：



持第二种意见的学者同时认为含有“二”以上数词的数量名结构都是以名词为中心语的，数量结构是名词的修饰语。而含有  $deu^1$  “一”的量名数结构则是以量名词组为中心的，数词“一”是前面的量名词组的修饰成分。这解决了包含“二”以上数词的“数量名”结构与包含“一”的“量名数”结构在组合关系上的矛盾，但却陷入了更大的矛盾，即，这两种结构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很显然应该是一样的，而它们的每个组合成分在结构中所充当的角色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这一方案也没有涉及3、4两种分布的分析。这就使得他们在名词与量词的关系问题上处于矛盾的境地，即，这些结构里的中心成分因与其组合的数词的变化而变化，当数词不是“一”时，整个结构的中心成分是名词，而当数词是“一”时，整个结构的中心也变成了量词。而从语义上讲，这两类结构的中心应该是一致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这些年来，一些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分析方法进行了补充、修正。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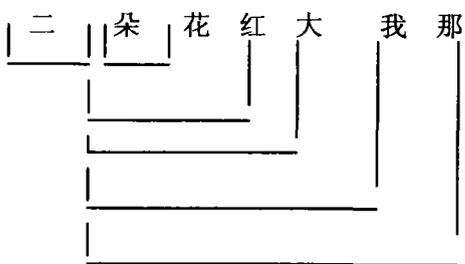
早期研究壮语的语法著作都认为在这些结构中的名词是受数量词组修饰的,  $deu^1$  的特殊用法似乎只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后来, 研究者都认识到, 这种看法只在分析数量名结构时是有效的, 而不能解决本文所列的 3、4 两种情况。

由于  $deu^1$  在修饰名词时的语序特殊, 它在句子中的地位问题最先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很显然, 在分析一个词组或结构时出现不连续的直接成分无论如何都是需要得到解释的。于是, 在同意篇首所述的分析方法前提下, 提出了一系列修正方案。

最早对壮语量词的特性作出系统分析的是袁家骅先生, 在《汉壮语的体词向心结构》(1979) 一文中, 他指出: “单就壮语看, 在量名组合体这个体词结构形式中, 量词和名词之间不能插入任何其他成分。把量词比拟为冠词是很不恰当的; 把量词当作中心成分(共名) 而把名词当作修饰或限制成分(专名), 倒是符合壮语造句法和构词法的共同原则的。” 因此, “把量名组合体作为整个复杂词组的核心, 也许更符合壮语的实际”。可以看出, 袁先生在这个问题的分析中, 发现并充分考虑了量词可以脱离数词而直接跟名词和能修饰名词的修饰成分组合的情况, 这也是第一次充分考虑了壮语量词分布特点而做出的分析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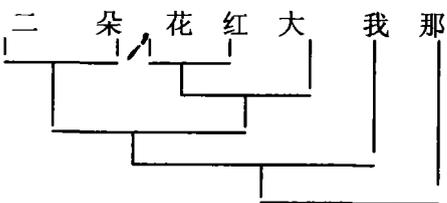
季永兴(1993) 对袁先生的看法提出了疑问, 他针对袁先生所谈到的本文 3、4 两种情况和所举的例子  $tu^2bin^1$  “飞的那只(鸟)”、 $ko^1san^1$  “高的那棵(树)” 提出, 这“是中心词名词末(原文误排作“末”)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 量词有替代中心名词的作用, 这是通例, 壮语如此, 汉语也是这样。” 对袁先生分析的例句:<sup>①</sup>

$soŋ^1 tu^3 va^1 diŋ^1 buk^7 kou^1 han^4$  我的那两朵大红花



季氏认为, 这样切分“没有注意到组合的层次性”, 因而应该分析为:

$soŋ^1 tu^3 va^1 diŋ^1 buk^7 kou^1 han^4$



就事论事, 季氏的分析是无可挑剔的。但是, 他在指出袁先生分析的缺陷时, 却依然不能对袁先生谈到的量名结构进行同样的分析, 只好说那里的量词是词头。很显然, 只考虑壮语跟

<sup>①</sup> 此处例句亦引自袁家骅1979。

汉语的共性而回避壮语的特性，并不能解决壮语语法分析上面临的问题。

在仔细考察壮语量词的分布以后，我们发现，壮语向心结构中的量词虽然跟汉语一样，经常与数词在语序上相连，但在语法关系上，壮语量词和数词的关系跟汉语大不相同，首先，壮语量词在有些结构里根本不与数词或指示词共现，而直接与名词组合构成词组，如  $tu^2 mou^1$  “猪”，甚至可以连名词都不出现，量词只接受一些可以修饰名词的成分修饰，组成名词性结构，如  $an^1 di:ŋ^1$  “红的”，此时量词就是体词性向心结构的核心。可见壮语量词确有充当向心结构中心的能力。

下面看看含有量词的结构可能存在的语法关系。

1. 类结构的内部结构关系是“定一中”修饰关系，其中的量词表示所指所属的类别，名词则是量词的修饰成分。这是各家都一致承认的观点，不赘述。

2. 类结构表明，量名结构除了可以受数词  $deu^1$  修饰以外，至少还可以受指示词修饰，通常认为，指示词是不能直接和名词组合的，它在与名词组合时必须以量词为中介。换言之，“量+指”结构和“量+名+指”结构都是常见的。在后一类结构中，指示词既然不能直接修饰名词，那么这类结构的切分也只能是“量+名+指”了。

3. 类结构的内部结构关系跟2类一样，只能是一个：

$tu^2 \ bin^1 \ han^4$	
中	定
中	定

4. 类结构表明，量词和它后面的修饰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同时它与其前面的数词又有着数与量的关系，那么这两类关系究竟何者是占主要地位的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从形式上看， $sa:m^1 tu^2 bin^1$  中的  $bin^1$  “飞”是其前面的量词  $tu^2$  的修饰语，而按照通常的看法， $tu^2$  “只”同时又是前面的数词  $sa:m^1$  的修饰对象，袁家骅先生认为它既受前面的数词  $sa:m^1$  “三”修饰，同时又是后面的动词  $bin^1$  的中心语，这显然是矛盾的。但仔细考察后我们发现，数词尽管总是与量词共现，它们之间却不存在必然的结构关系。因为量词具有区分它后面的名词的类的作用，它与名词的共现频率也是相当高的。而且，在体词性向心结构中，凡是能修饰名词的成分也都能修饰量词，在名词不出现的场合，量词总是作为名词的替代成分出现。这说明量词和名词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在没有其他修饰成分（指示词充当的修饰成分除外）的情况下，量词才和数词发生直接的结构关系。因此，在上述的四种含有量词的向心结构中，唯一的中心成分应该是量词，而不应该是名词或其他的什么词。否则就无法解释。

根据壮语语言材料的实际，我们认为，壮语量词在分布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跟数词组合表示名词性成分的单位数量，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作为中心成分受名词及名词修饰语的修饰。尽管数量结合的关系很紧密（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但量名结构的组合紧密程度至少不比数量结构差，其间也不能插入其他成分。量词在很多语境中还可以取代名词，直接充当被修饰成分或结构的中心语。由此可见，壮语向心结构中的量词与数词虽然经常在语序上相连，在语法上却不能说有跟汉语一样直接的结构关系。量词无论是在语法上还是在语义上跟名词的关系都要比跟数词更近一些。从表达的语法意义上来讲，可以根据与数词、指示词和名词及名词修饰语的组合情况作一个简单的分类。壮语向心结构中的量词只有在与数词在语序上相连而后接名词性成分时，才可看作在语法上表示事物的单位，而在处于名词性结

构中心位置时则表示事物的大类，量名结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含有“一”的意思，而只泛指该名词所指的事物。比如 tu<sup>2</sup>mou<sup>1</sup>指的是“猪这类动物”或“猪类”，pou<sup>4</sup>vun<sup>2</sup>指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人”。当量词在语法上表示类别的时候，它往往是只受别的词语修饰而不能作其他成分的修饰语的。因此，如果非要给这样的量名结构找出个中心来的话，那这个中心只能是量词，不可能是名词。

#### 参考文献：

-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壮语量词》，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
- 薄文泽：《壮语泰语名量词的句法分布及性质异同》，《东方研究》2001年卷，243—253页。
- 季永兴：《壮汉数词代词量词结构形式比较分析》，《民族语文》1993年第4期。
- 梁敏：《壮侗语族诸语言名词性修饰词组的词序》，《民族语文》1986年第5期。
- 刘益堂：《汉壮语线状量词词群的对比研究》，《三月三增刊·民族语文论坛》2000年第1期。
- 韦庆稳：《壮语语法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
- 韦庆稳、覃国生：《壮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0年。又见王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
- 袁家骅：《汉壮语的体词向心结构》，《民族语文》1979年第2期。
- 张公瑾：《论汉语及壮侗语族诸语言中的单位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 周耀文、方峰和：《壮语傣语名量词的差别及其缘由》，《民族语文》1984年第2期。
- Mary R.Haas 1942: The Use of Numeral Classifiers in Thai, *Language* Vol.18,P201-205.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on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classifiers in Zhuang language,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classifier in the language can combine the numeral to form structures to modifier nouns and the structures can also be modified by nouns.

(通讯地址：100871 北京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